

当代中国城市基督教何以兴起？

张春泥 崔琪 盛禾

【摘要】近年来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呈现出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趋势。针对当代中国城市基督教兴起的原因,本文总结了社会网络缺失、基督徒城镇化、西方文化渗透三种观点,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对这三个观点的普适性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大量聚集在城镇的流动人口为基督教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加入基督教成为城市边缘人获取社会支持的途径。相较之下,农村基督徒的城镇化和西方文化的渗透均非城市基督徒增长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城镇化;城市基督教;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作者简介】张春泥,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长聘副教授;崔琪,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盛禾,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世界宗教文化》(京),2022.1.66~73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宗教事务局科研项目“城市基督教问题研究”(MT2006)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基督教在我国过去四十年里的发展非常迅速。根据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解放初我国约有70万基督徒,1982年约为300万。到1997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时,我国基督徒已达到1000万人上下。2018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显示,当前我国基督徒人数达到3800多万。据此测算,1949-2018年间我国基督徒平均年增长率约为6%,远超早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时期年增长率3.42%的发展速度,^①而这一速度曾被认为是基督教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基督教的发展与我国社会变迁的诸多方面相互交叠,其中之一便是快速的城镇化。改革开放最初二十年,基督教在我国农村地区的发展尤为迅速,但进入21世纪以来,基督教在城市的发展变得更为突

出。主要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显示,^②中国基督徒的比重在近几年大约稳定在2%上下,但基督徒的城乡构成却明显发生了变化:居住在城镇的基督徒占总人口的比例从2006年的0.70%增长到2018年的1.19%,而居住在农村的基督徒却从2006年的1.12%下降到2018年的0.83%。大约在2012年前后,城镇基督徒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逐渐超过了农村基督徒(见下页图1)。换言之,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正在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中国基督教人口的主体正在转向城市人口,中国基督教会的主流正在从农村教会向城市教会转移。^③

在这一趋势之下,城市基督教兴起的原因已成为学界和政界都极为关注的问题。以往对农村基督教发展原因的探讨通常包括农村地区的信仰真空、公共性解体、社会保障缺位、基督教传播模式的变迁以及民间信仰对基督教的影响等方面,^④但是这些原因并不完全适用于解释基督教在城市的兴起。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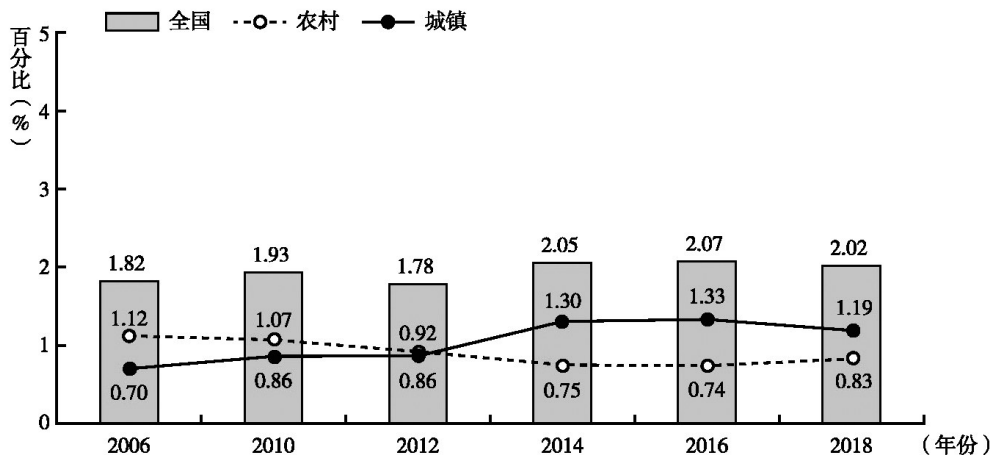


图1 全国、农村、城镇基督徒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趋势

竟,城市的社会文化空间与农村存在明显差异,为基督教的兴起也提供了一些特定的土壤。对此,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解释。^⑤不过这些对城市基督教兴起的解释大多来自作者的个案经验或主观感受,并未经过大规模调查数据的检验。本文关注中国城市基督教兴起之成因,利用全国性调查数据来检验以往文献提出的社会网络缺失、基督徒城镇化、西方文化渗透三大因素在解释中国城市基督教兴起上的适用性。

二、中国城市基督教兴起的三个假设

当前学术界对城市基督教兴起的成因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社会网络缺失与城市基督教的兴起

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来看,城市基督教的兴起与城市生活者的社会联结特征密不可分。个体在城市生活中的原子化和人情网络的疏离,产生了大量重建社会网络与情感纽带的需求,而基督教这种聚会型宗教恰好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这种需求。比如,美国西部大开发中形成的大量脱离原有社会联系的拓荒者曾是摩门教兴起的重要背景。^⑥同样地,较之由宗亲、熟人关系编织而成的农村乡土社会,城市社会的人口流动性和异质性更高,社会分化程度更高,个体更加孤独与疏离,加之中国城市的家庭规模更小,离婚、不婚、无子或少子现象更普遍,地缘、亲缘关系的缺失或断裂导致城市生活者更需要亲属关

系之外寻求精神慰藉与社会支持的人际网络,而信仰基督教则成为弥补社会网络缺失的渠道之一。

生活在城市的诸多群体中,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匮乏尤为突出。沃尔斯—雷德菲尔德模式指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是一个原有人际关系解组、移民不断个人化,最后失去自己原有文化特征和社会关系的过程。^⑦对处于“半城市化”状态的农民工而言,一方面长期的城市生活使他们模糊了对原乡土社会的认同。另一方面,在二元格局之下,城市对外来人口的排斥也使他们难以产生对城市流入地的归属感。面对上述双重社会隔离,农民工会试图在城市中构建起他们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来获得归属感和认同,^⑧而宗教恰恰可以成为将这些人重新连接起来的桥梁之一。^⑨边缘人理论^⑩指出,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异乡人更可能信仰宗教,因为教会组织所宣扬的慈善精神、互助观念等更能迎合边缘群体在心理归属和精神慰藉方面的需求。^⑪一些农民工通过信教、借助教会平台,在社会经济、精神文化、人际关系等方面增强了对城市的适应与融入感。^⑫

上述论述表明,城市社会的原子化特征提供了基督教兴起的土壤。若要检验这一观点,我们可以假设:由于基督信仰能够充实城市生活者的社会网络,尤其是为城市边缘人提供归属感和群体认同,因此缺乏社会支持网络的都市人更可能信仰基督教。

我们将该假设称为**社会网络假设**。

(二) 基督徒城镇化与城市基督教的兴起

城市基督教的兴起除了可能是回应个体层次的互助和心理需求外,也可能是宏观层次人口分布结构性变化的后果。2000年,中国仍有63.91%的人口生活在农村,^⑧到2010年城乡人口分布已大致相当,^⑨而到了2020年,居住城镇的人口已达到63.89%,可见,短短二十年间人口的城乡分布已发生调转。^⑩较之发达国家的人口城市化速度,^⑪我国人口城乡分布的变动是巨大的,也是迅速的。由于城镇化所引发的大规模的乡—城人口迁移和城市区域扩张,无论是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镇或是农村被划归为城镇,均可能导致居住城镇的基督徒规模增长。这一现象较早早在陈村富等学者在浙江的田野调查中被观察到:受城镇扩大的影响,有的农村教会变为了市区教会,不少教徒也由农民身份转变为从事其他职业的城镇人口。^⑫唐晓峰也指出,农村城镇化进程对农村基督教产生了较大影响,很多农民搬迁至周边城镇居住,其中基督徒占比不小,导致农村基督徒人数减少。^⑬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包括农村基督徒在内的大量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或准城市人口,农村基督徒数量减少,城市教会出现了一批包括农民工基督徒在内的新型基督徒群体。^⑭

这些观察表明,当代中国城市基督教的兴起一定程度上是以农村基督教的既有发展和传播为基础,是基督徒城镇化的后果。由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量农村基督徒通过人口流动或行政区划调整成为城镇基督徒,从而带来了城市基督教的发展。若这一观点具有普适性,我们可以假设,城市基督徒增长的主体应由经历城镇化的原农村基督徒所构成——他们在进入城市以前就已信仰基督教,而不是进入城市之后出于互助和心理需求才成为基督徒。这一假设可称为**基督徒城镇化假设**。

(三) 西方文化渗透与城市基督教的兴起

自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以来,西方文化便被视为进步的和普适性的,尤其是进入全球

化时代,西方文明更是被一部分中国人奉为圭臬。其中,基督教作为西方宗教也被视为西方文明的代表之一。

有学者指出在全球化市场背景下,许多中国人认为佛教、道教和儒教是传统的、封建迷信的、落后的,与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不相容,而基督教是民主的、现代的和国际化的,被视为与麦当劳一样的全球化标志。艾菊红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由于中国传统思想体系已经不再能够提供精神慰藉,人们开始寻求新的精神资源,一些大学生开始到基督教中寻求精神慰藉和人生终极意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外交流加深,海外留学生大量增加,他们开始接触基督教,其中不少人归信后回国开拓教会或参与团契服事。尤其是当知识分子发现西方文明深受基督教影响后,中国知识界也开始主动了解基督教,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知识分子开始从事汉语基督教研究。正是在这种全球化文化渗透的大背景下,以城市知识分子为主要会众的城市新兴教会开始出现。^⑮孙尚扬等在对北京市大学生的宗教态度调查中发现,近四成大学生认为基督宗教代表了具有吸引力的西方文明。^⑯

以上观点指出了中国城市基督教兴起的第三种可能的因素,即西方文化的渗透。鉴于基督教被视为西方文明的代表之一,而城市又是西方文化传播的主要土壤,因此,城市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对此,我们假设:如果基督教对城市人的吸引力来自于其代表的西方文化,那么青睐西方文化的城市人应该更可能信仰基督教。这一假设可称为**西方文化渗透假设**。

上述我们总结了以往文献对城市基督教兴起的三种归因。这三种观点在学界均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普适性却尚未被大规模调查数据检验。本文接下来将检验其在解释中国城市基督教兴起上的适用性。

三、研究数据与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简称CFPS)。CFPS是我国最权威的全国性社会调查项目之一,也是率先进行宗教测量改进的调查。CFPS自2012年起加入了宗教模块,为了让对宗教信仰的测量工具更贴近中国人宗教生活的实际状况,卢云峰、张春泥在2014、2016、2018年问卷中持续改进了宗教访题的设计。以往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家庭教会存在,中国基督徒的数量被严重低估。^②对此,卢云峰、张春泥提出以神灵本位的测量方案取代传统的宗派本位的测量方案来更好地反映受访者的真实信仰状况。^③神灵本位的测量方案不直接提问受访者的宗教派别归属,而是通过提问受访者信哪些神来间接了解他们的信仰状况。在本文中,如果受访者回答他们信“耶稣基督”,则被认定为是基督徒。CFPS 2018使用组合单选的形式来呈现神灵信仰的选项,即受访者需要对每一种信仰(神)都进行是(信)或否(不信)的回答。我们发现,经过这一题型调整后,在回答自己信仰耶稣基督的人中有相当比例者也同时信仰其他制度性宗教或者民间信仰。对此,我们定义了两种基督徒:从一神教的排他性出发,将只信仰基督教但不信仰其他制度性宗教的人定义为“独立基督徒”,他们在CFPS 2018全部受访者中占2.02%;从中国宗教的混合性出发,将信仰耶稣基督也信其他制度性宗教对应神灵的人暂且定义为“混合基督徒”,他们在样本中占3.87%,甚至高于独立基督徒的比例。对于混合基督徒,他们难以进行宗派分类,他们也许是基督教的潜在信徒,也许只是对基督教抱有好感的人,或者是对宗教有广泛兴趣的人。因此,我们还是以独立基督徒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将混合基督徒作为参照和扩大比较的对象之一。此外,为了证明我们所讨论的因素是基督教而不是宗教发展的一般性原因,我们也将在中国信徒构成中占比最高的独立佛教徒(占15.6%)作为一个与基督徒相对比的类别。因此,本研究总共涉及四类群体的比较:独立基督徒、混合基督徒、独立佛教徒、不信仰任何宗教者(简称无信仰者)。为防止混淆,其他信仰者不进

入分析样本。

借助CFPS丰富的个人和家庭信息,我们可以将本文提出的三个研究假设用相关变量予以操作化:针对社会网络假设,鉴于中国人的社会网络以家庭和乡土为基础,我们从婚姻家庭结构和人口流动两个方面测量人们缺乏社会支持网络的状态。通常而言,婚姻家庭完整的常住人口,其社会支持网络相对丰富,反之不在婚、独居、无子女、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更为缺乏。针对基督徒城镇化假设,我们重点关注城镇化的农村基督徒在城镇基督徒中的比重。基于CFPS的追踪调查设计(panel design)特性,我们通过追踪受访者在不同年份调查时的信仰状态(是否为基督徒)和居住地城乡属性(城镇或农村)的变化来检验是否城市基督教的发展主力是城镇化的农村基督徒。针对文化渗透假设,我们假设青睐西方文化的人更可能信仰基督教(即成为独立基督徒)。由于CFPS没有直接测量人们对西方文化的爱好或向往程度,我们选择了间接指标,假定青睐西方文化的人对英语的重视度(“英语的重要性”1-5分评分)更高、对美国人表现出更高的信任度(“对美国人的信任度”0-10分评分)、更倾向于送孩子出国留学(是否“计划送孩子出国留学”,否或无0-15岁子女者为参照组)。此外,鉴于国内基督徒呈现出女性多、老年人多、低学历者多的三多特征,^④而这些特征也会与婚姻家庭结构、人口迁移、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度相关,因此,我们在多元回归分析中还控制了性别(女性为参照组)、年龄、受教育年限这些社会人口特征。CFPS采用的是国家统计局的标准对受访者居住地所在区县进行城乡划分,城市地区包括市和镇,我们的分析样本为CFPS 2018调查时居住地为城镇(市和镇)的16岁及以上受访者。

四、研究发现

(一)是不是社会网络匮乏的人更容易信仰基督教?

我们假设婚姻和家庭上的不幸、人口流动均会带来社会网络的断裂和社会联结的缺失,如果社会网络假设成立,则在基督徒群体中能够观察到更高

比例的婚姻家庭不幸者和流动人口。然而表1显示独立基督徒并没有在未婚、离异、丧偶、独居、无子女的比例上明显高于无信仰者,甚至他们处在婚姻中的比例更高、独居和未生育子女的比例更低。但独立基督徒中子女不同住和流动人口的比例要明显高于其他三类群体。

由于婚姻、生育、居住、流动四个方面相互交织,比如独居可能是由于离异或丧偶、人口流动会导致亲子分离等,我们接下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来检验家庭和乡土网络断裂对宗教信仰的影响。由于宗教信仰归属划分为四个群体,故采用多类别逻辑斯蒂回归(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并以无信仰者作为基准类。与表1一致,表2也显示不在婚和独居对成为基督徒没有显著影响,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与子女不同住者和流动人口更可能成为独立基督徒,而不是无信仰者。上述分析表明,家庭社会支持的缺乏在独立基督徒中不太突出,仅与子女

不同住者更可能成为独立基督徒,而缺乏社会支持网络的流动人口是成为独立基督徒的重要因素,这与社会网络假设的预测相符。

(二)是不是基督徒城镇化带动了城市基督徒的增长?

基督徒城镇化假设认为基督徒从农村流动到城市从而导致了城市基督徒规模的增加。针对这一假设,我们首先将CFPS 2018城镇独立基督徒依据其户籍属性和城乡居住地来源划分为三类:城镇非农户籍基督徒、城镇农业户籍基督徒、进入城镇的农村基督徒。第一类城镇非农户籍基督徒包括城镇本地居民和非农户籍的流动人口。第二类城镇农业户籍基督徒指的是进入城镇后由不信仰基督教转为信仰基督教的农村流动人口。第三类则是进入城镇的农村基督徒,主要的判断标准为CFPS 2012-2016年已声称是基督徒且当时居住地为农村,2018年居住地变更为城镇的信徒。如果基督徒

表1 两类基督徒、无信仰者、佛教徒的婚姻家庭和流动状态(%)

	无信仰者	独立基督徒	混合基督徒	独立佛教徒
未婚	25.8	8.0	21.7	18.9
离异	2.2	2.8	2.9	4.1
丧偶	3.5	6.6	6.1	6.2
独居	8.1	5.4	8.3	6.1
未生育子女	37.9	21.6	36.9	32
子女不同住	14.0	27.9	17.8	14.3
流动人口	13.7	22.6	10.2	10.2

表2 社会支持网络缺失与城镇居民信仰类型的多类别逻辑斯蒂回归估计

	独立基督徒	混合基督徒	独立佛教徒
未婚(参照组:在婚)	-0.572(0.342)	0.172(0.211)	-0.071(0.279)
离异(参照组:在婚)	0.295(0.406)	0.276(0.295)	0.679*(0.325)
丧偶(参照组:在婚)	0.053(0.310)	0.134(0.235)	0.393(0.296)
独居(参照组:非独居)	-0.350(0.326)	-0.061(0.193)	-0.315(0.280)
未生育子女(参照组:子女同住)	-0.147(0.213)	0.128(0.151)	-0.075(0.200)
子女不同住(参照组:子女同住)	0.507**(0.165)	0.200(0.140)	-0.097(0.191)
流动人口(参照组:非流动人口)	0.976**(0.165)	-0.193(0.158)	-0.201(0.205)
截距项	-3.603**(0.393)	-1.918**(0.282)	-1.990**(0.363)

注:**p<0.01,*p<0.05;括号中数字为标准误。因变量基准类为无信仰者。N=4781。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篇幅所限,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在表中省略。

城镇化假设成立,我们应该观察到第三类占城镇基督徒的主流。然而CFPS却显示,这一类群体的比重极低,仅占城镇基督徒的5%,相较之下,前两类长期生活在城镇的基督徒才是城市基督徒的主流,其中,城镇非农户籍基督徒占城镇基督徒的54%,城镇农业户籍基督徒占城镇基督徒的41%。由此看来,城镇化的农村基督徒只占城市基督徒的很小比例,基督徒城镇化不是城市基督徒增长的显著因素,大多数城市基督徒是城镇本地信徒或已经长期生活在城镇中的流动人口基督徒,后者很可能是在进入城镇以后才成为基督徒。因此,基督徒城镇化假设的普适性并未得到支持。

(三)是不是更青睐西方文化的人更可能信仰基督教?

针对西方文化渗透假设,我们主要检验成为基督徒与青睐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表3显示,独立基督徒并没有比无信仰者和独立佛教徒更向往西方,相反,他们对美国人的信任度更低,认为英语更加不重要,计划送孩子出国留学的意愿也更低。不过相较于无信仰者、独立佛教徒和独立基督徒,混合基督徒对西方文化的好感似乎更大,他们有意愿送孩子出国留学的比例和对美国人的信任度都相对较高。

表4的多分类逻辑斯蒂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

西方文化因素对成为独立基督徒(较之无信仰者)没有积极的影响,甚至对英语重要性的评价越高会显著降低成为独立基督徒的发生比。但是,那些对美国人的信任度更高以及有计划送孩子出国留学的人更可能成为混合基督徒,而不是无信仰者。之前我们提到,混合基督徒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他们的宗教身份并不明确,因此我们只能认为文化渗透可能会增加一些城市人对基督教的兴趣和接触,但这与实质性的归信仍有区别,其不能作为城市基督教的兴起和城市基督徒增加的原因。

五、结论与讨论

近年来,基督教在城市的兴起已成为我国基督教发展的新趋势,居住城市的基督徒在规模和人口比例上已逐渐超过了居住农村的基督徒。不同于基督教在农村地区的传播,当代中国城市基督教的兴起更多地与城镇化、现代化因素联系在一起。在以往对我国城市基督教兴起的解释中,基督教的社会网络功能、基督徒城镇化和西方文化渗透论是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社会网络的观点强调的是宗教对社会团结的积极功能,城市基督教的兴起根源于中国快速城镇化和人口大流动背景下造成的个体原子化、归属感的缺失、互助与社会支持的不足,让信缘关系成为了一种可替代性的支持。与社会

表3 基督徒、无信仰者、佛教徒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

	无信仰者	独立基督徒	混合基督徒	独立佛教徒
对美国人的信任度(0-10分)	2.9	2.6	3.4	2.7
英语的重要性(1-5分)	3.2	2.9	2.8	3.0
计划送孩子出国留学(%)	7.9	6.5	10.6	6.6

表4 西方文化态度与城镇居民信仰类型的多分类逻辑斯蒂回归估计

	独立基督徒	混合基督徒	独立佛教徒
对美国人的信任度	-0.017(0.029)	0.112**(0.021)	-0.002(0.027)
英语的重要性	-0.126*(0.050)	-0.135**(0.039)	-0.059(0.048)
打算送孩子出国留(参照组:否)	-0.102(0.286)	0.385*(0.183)	-0.181(0.271)
截距项	-3.515**(0.414)	-1.738**(0.318)	-1.712**(0.391)

注:**p<0.01,*p<0.05;括号中数字为标准误。因变量基准类为无信仰者。N=3830。控制变量同表2。

网络的观点类似,基督徒城镇化的观点也认为城市基督教的兴起与中国的大规模城镇化有关。但不同于前者,基督徒城镇化的观点并非关注城市社区自身区别于农村社区的特征,而是更多地将城市基督教的发展与农村基督教发展的既有基础联系起来,即农村基督徒是城市基督徒的主要来源。西方文化渗透论关注的是现代化和全球化下的文化竞争,基督教作为西方文明的代表之一,很可能成为中国城市人表达对西方文明向往和追求的一种途径。这一观点似乎将城市基督徒的主要来源指向那些城市中产阶级、高学历者。这三种观点在以往不同的个案研究中都能找到一些证据,但它们何者在解释城市基督教的兴起上更具普遍意义则未被检验。

本研究有三点发现:第一,城市基督教的兴起与流动人口脱离亲缘、地缘关系所面临的社会网络匮乏、社会支持缺乏有关。较之本地人口,流动人口更可能信仰基督教,以此获得社会支持和归属感。第二,农村基督徒的城镇化并非导致城市基督教发展的主因。事实上,由农村基督徒转化为城镇基督徒的人仅占很小的比例,绝大多数城镇基督徒的来源还是流动人口信教或者城镇本地居民信教。第三,城市基督教的兴起与城市人对西方文化的向往之间没有明确关系。对西方文化的好感可能会增加城市人对基督教的好奇和兴趣,但未必促使他们成为基督徒。事实上,城市基督徒较之无信仰者和佛教徒对英语重要性的评价更低、更不倾向于送孩子出国留学、对美国人的信任度也更低。

总之,当代中国城市基督教的兴起并不是简单的农村基督教的城镇化,也并不是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基督教文明在中国城市渗透的结果,即便这些因素有一些影响,但也是局部的或有限的。较之这些因素,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背景下,城市聚集了大量的异乡人、城市边缘人,他们的生活处境才是基督教在城市发展的重要土壤,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些群体在社会保障、社会交往和情感上的缺

失。这一发现,对我们如何评价基督教向城市转移和城市基督教的治理会有一定的启示。

感谢卢云峰、吴越等对本文写作和修改的建议。

注释:

①[美]罗德尼·斯塔克:《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黄剑波、高民贵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页。

②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2010)、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2-2018)。

③参见陈村富、吴欲波:《城市化过程中的当代农村基督教》,《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2期;段琦:《2011年中国基督教主要事件及城市化对教会的影响》,金泽、邱永辉主编:《中国宗教报告(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88页;吴越、张春泥、卢云峰:《反思“农村西方宗教热”:迷思还是事实?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分析》,《开放时代》2020年第3期。

④参见吴理财、张良:《农民的精神信仰:缺失抑或转化?对农村基督教文化盛行的反思》,《人文杂志》2010年第2期;张良:《乡村公共性解体与基督教文化发展》,《人文杂志》2014年第3期;郑风田、阮荣平、刘力:《风险、社会保障与农村宗教信仰》,《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3期;阮荣平、郑风田、刘力:《公共文化供给的宗教信仰挤出效应检验——基于河南农村调查数据》,《中国农村观察》2010年第6期;韩恒:《传播模式与农村基督教群体特征的演变——基于河南省14个调查点的分析》,《世界宗教文化》2012年第5期;高师宁:《当代中国民间信仰对基督教的影响》,《浙江学刊》2005年第2期。

⑤参见高师宁:《城市化过程与中国基督教》,《宗教学研究》2011年第2期;单渭祥:《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基督教》,《中国宗教》2011年第10期;黄剑波:《“承认的政治”与信仰生活——以一个民工基督教会为个案》,许志伟主编:《基督教思想评论·总第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唐晓峰:《以三个基督徒群体特征看当今中国教会》,许志伟主编:《基督教思想评论·总第十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⑥[美]罗德尼·斯塔克:《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黄剑波、高民贵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7-68页。

⑦ Kearney Michael, "From the Invisible Hand to Visible Feet: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f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86, 15(1): 331-361.

⑧王超文:《读〈都市里的乡村教会〉》,陈进国主编:《宗教人类学(第五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⑨卢云峰:《变迁社会中的宗教增长》,《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⑩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在对城市移民的研究中借鉴齐美尔的“陌生人”理论,于1928年发表的《人类的迁徙和边缘人》一文中正式提出“边缘人”理论。“边缘人”是指对主流社会群体的参与都不充分,处在两个或多个群体之间者。

⑪参见曹永福、宋月萍:《农民工为何流动后信教:基于社会融合困境的解释》,《人口与发展》2017年第6期;李龙、宋月萍:《当前流动人口宗教信仰状况分析》,《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6期;范丽珠:《宗教与中国城市新移民研究的理论思考》,金泽、李华伟主编:《宗教社会学(第四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73-184页。

⑫参见王平、梁文慧:《农民工信仰基督教的调查与思考——以合肥市为例》,《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范丽珠、陈纳:《宗教信仰与城市新移民(乡—城)刍议——社会融入问题的另一个视角》,《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2期;黄剑波:《都市里的乡村教会——中国城市化与民工基督徒》,道风书社2012年;黄剑波:《“承认的政治”与信仰生活——以一个民工基督教会为个案》,许志伟主编:《基督教思想评论·总第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Cao, Nanlai, *Constructing China's Jerusalem: Christians, Power and Place in the City of Wenzhou*,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⑬参见国家统计局:《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

⑭参见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

⑮参见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

⑯自18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人口城市化从缓慢起步、率先发展到全面普及,大致历经了250多年。参见:何志扬:《城市化道路国际比较》,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73-74页。

⑰参见陈村富:《转型期的中国基督教——浙江基督教个案研究》,东方出版社2005年;陈村富、吴欲波:《城市化过程中的当代农村基督教》,《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2期。

⑱唐晓峰:《以三个基督徒群体特征看当今中国教会》,许志伟主编:《基督教思想评论·总第十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⑲段琦:《2011年中国基督教主要事件及城市化对教会的影响》,金泽、邱永辉主编:《中国宗教报告(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⑳艾菊红:《城市新兴教会——以锡安教会为例》,高师宁主编:《田野万象——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报告》,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18年。

㉑孙尚扬、李丁:《北京市大学生对基督宗教态度的调查报告》,《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㉒参见 Lambert Tony, "Counting Christians in China: A Cautionary Report",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2003, 27(1), 6-10; Paul Hattaway, "How Many Christians are There in China?", <https://asiaharvest.org/how-many-christian-are-in-china/>, 2010. accessed June 10, 2021.

㉓关于神灵本位测量方案的详细介绍请参见 Zhang, Chunni, and Lu, Yunfeng, "The Measure of Chinese Religions: De-nomination-based or Deity-based?",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2020, 6(3), 410-426.

㉔唐晓峰:《以三个基督徒群体特征看当今中国教会》,许志伟主编:《基督教思想评论·总第十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